

鄭觀應

与

孫中山

□钟卓安

近代广东,由于得风气之先,人才辈出。其中香山县(今中山、珠海两市域内),更因毗邻港澳这两个中国最早开放的港口,不但成为杰出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等一批先进人物的故乡,而且产生了象孙中山那样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近百年来,香山、乃至广东,都为有孙中山和郑观应这些具有先进思想和作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历史学家的目光为孙中山的伟大形象强有力地吸引,而对郑观应的研究显得严重不足。

郑观应的家乡雍陌与孙中山翠亨故居,可谓近在咫尺,但因年龄相距二十有四,且经历迥异,因此他们的思想长期少有沟通。然而,共同的社会背景,相通的忧国忧民感情,以及对西方世界的共识,使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直到兴中会成立前夕都是基本相同的,但往后就分道扬镳了。本文试图根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五卷本同目前所能找到的孙中山的三篇同期作品,以及前后的一些情况,进行简要的比较研究,以求进一步认识这两位卓有贡献的杰出人物。

一、忧国忧民的志士

无论是郑观应到上海学习商贾的1858年,还是孙中山赴檀香山求学的1878年,总的说,从1842年《南京条约》开始的中外关系新格局,正处在日益深化之中,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无力自拔。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国情下步入社会的。

1860年,在上海英国宝顺洋行做勤杂工的郑观应,终于钻营到管理该洋行丝楼和轮船揽载业务的美差,走上了买办的道路。但他并没有因此背离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当得知中国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和俄国割取我东北大片领土时,情绪激愤,说:“庚申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①不久便开始收集资料,决定撰写《救时揭要》,以“扶掖隐微,切中时弊”之语,“大声疾呼,唤回醉梦”,②挽救时局。再往后九年,1871年,“肝肠时事,思挽时局,幽愁积愤”的郑观应,见“天下多故,事变靡常,外有关于痼疽之将我,内有同于症瘕之潜积。元气日耗,固疾日深”。③又准备写作另一部著作《易言》。王韬说,那时的郑观应如能被荐重用,以《易言》的主张来补救时局,那么必将拭目可见“皇猷克赞,骏烈获成,喁喁然熙熙然,国家安,中外提福”的景象。④1886年开始辑著的《盛世危言》(五卷本),终于在1892年完成,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付梓。

何谓“盛世危言”?顾名思义,即隐藏于“盛世”背后的危难之谓也。在“太平盛世”敢于揭隐危言,是郑观应超人胆略的表现。与郑观应“谊同宗,生同里闾”,曾任津海关道的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的郑藻如说,《盛世危言》“皆纵论中外情势,商榷古今利弊,旁搜远绍,网罗无遗,有当世豪贤欲言而不知所以言,循谨巽柔之辈知言而不敢尽其所以言者,真所谓大家炎炎,小儒见而咋舌者也”。⑤认为“若能由此书引绪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人事既工,天心弥眷,安见此日忧危之语,非即后日喜起之先声?则此书实太平之瞽矢,抑亦盛世所亟宜上闻者也。”⑥郑藻如此评,甚中肯綮!

《盛世危言》正是郑观应目睹三十年洋务运动终于走入死胡同,企图寻求新出路的产物。他说,从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大谈洋务,但是“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⑦面对近二十年来“屏藩尽撤,强邻日逼,西藏、朝鲜危同累卵,而我国工艺之精、商务之盛,膛乎后于日本”的现实,郑观应“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于是“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愿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爰检旧篋,将先后所论洋务五十五篇”,辑为《盛世危言》(五卷本),^⑧“以期天下人共知病源所在,毋讳疾而忌医,勿畏难而惮改,邀求三年之艾,以起痼疾……冀安我国家万年有道之基”。^⑨

就这样,从《救时局要》到《易言》,再到《盛世危言》,谱记着郑观应步入社会大舞台之后,以救时为己任的忧国忧民思想。

故里孙中山,在兴中会成立以前,可贵的忧国忧民思想同样象一根洁白的银线,贯穿于他的方方面面。

据说孙中山还在童年的时候,就曾表示要设法对付那帮欺凌中国人的野蛮洋人。^⑩十五岁那年,因见檀香山的学校教育远胜家乡,“而改良祖国、拯救同胞之愿于是乎生”,怀抱“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的思想。^⑪1886年,中法战争硝烟刚散,即疾呼“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⑫次年,更开始结交并接受荷后某些改良主

义思想的影响,再过三年,便致函辞职在籍的官僚、郑观应的堂兄郑藻如,比较系统地提出改变民穷国弱面貌的改良主张,随后又同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建立了关系,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见解相同、相似者多多。1893年,即与尤列等青年志士议设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兴中会”,^⑬也曾力图与改良主义大师康有为结交。^⑭在此前后被郑观应收入其《盛世危言》的孙中山作品《农功》和孙中山通过郑观应投送李鸿章的《上李鸿章书》,不但表明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关系已进一步加强和密切,而且就作品的内容来说,亦与郑氏同期著作的基调大致同一。

孙中山改良祖国的思想,在上述三篇作品中历历可见。其中《致郑藻如书》不但流露出他不甘“沦落”和不愿“自弃于盛世”的无私胸怀,而且甚至望郑藻如能就他所提兴利除害的倡议,先在本乡试验,然后由近及远地推广,使国家受幸。^⑮《农功》的基本思想与此同格,认为“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就在于实行“以农为经,以商为纬”之国策。^⑯《上李鸿章书》以其内容之完备,论说之充分,而超出上述二作,但仍然是他在“比见国家奄奄富强之术,日新月异,不遗余力,马灵马灵乎欲与欧洲并驾”的洋务运动的热潮中,以千虑一得,“仰冀高深于万一”的忐忑心情,向李鸿章所呈的“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期待李鸿章对他“为生民请命”



之举“有以玉成”^{①7}的产物。由此看来,在兴中会成立以前,孙中山把郑观应引为同道,是十分顺理的事情,他们不但具有近邻乡谊,而且更有基调同辙的思想和抱负。

二、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

不管是郑观应,还是孙中山,作为关心国事民生的思想家,所碰到的最严重和紧迫的社会问题,是外敌侵袭和国家衰败,因此如何御侮兴邦就成为他们致力解决的第一主题。

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的思想十分丰富,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就本文主题所关来说,下面两点是尤为重要的。

(一)把反对外敌侵略摆在首位

郑观应对近代殖民战争持普遍反对的态度,认为各国之失和开战,大都是“外托信义,阴肆并吞,名辟商途,实窥土地,……只知树威克敌,不顾糜烂其民”的“不仁不义”的行为,它“上干天地之和,即无事之秋亦岁耗民财以供兵饷,国安得不困?民安得不穷乎?①8列强对于中国,同样是“托名商务,意在并吞”。①9据此断言,中国“防外侮更甚于防内患”。②0

在四周强邻虎视眈眈的现实面前,中国应筹何等对策?“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郑观应说:“防俄为先。盖俄人包藏祸心,匪伊朝夕,为我边患亦已数见不鲜”。即乘英法联军侵略之危,夺我东北大片土地,又“不惜巨款”营造西伯利亚大铁道于“不毛之地,非有狡谋更何为乎?”那么中俄边界东西万里,究以何处为重?曰:“昔以西北为急,今日以东方为重。……先于东北之奉天、吉林、黑龙江一带(布防),俟有余力,再兼顾新疆”。②1

当然,“英法亦不可不防”,防英法之所以固西南!②2

郑观应十分重视来自日本的威胁,说近年日本不但“讲究水师,频添战舰”,且“时入内地暗察形势,绘图帖说”,故“其志叵测,恐终为中国边患”。②3果然,不数月,甲午战争爆发,此说应验。

郑观应还强调,有朝一日,东西方列强很

可能形成侵略中国的联盟。比如,假若俄法“南北夹攻”,那么英德美日“必以屯兵保护商人、教士为名,亦分占通商各口”。认为它们的“大欲将不在赔费,而在得地”,因此“后患之来不堪设想。”②4 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又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郑观应的预言。

为了应付列强侵略危机,郑观应设计了许多方案,可谓绞尽脑汁。他说:“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②5御敌者以自强为本,以自守为先”;②6战争之胜负不在海域,而在登陆后之双方较量,故“陆战为天下所必争”,“今日防边尤重于防海”,“防海犹可从缓,防边实为要图”。②7要求清政府一改“重文轻武”积习,②8改革军制,裁汰八旗、绿营,扩充练勇,②9购买和仿制新式武器,按西法勤加训练,使之成为握有利器的敢死之兵;③0实行“寓兵于民”的“团防”政策,使中国“处处团防,村村联络,休戚相关,国无筹饷之艰,兵无远调之苦”,说中国“转弱为强,在此一举”。③1

所有这些看法与建议,都反映出郑观应关心国家安危,把反对外敌侵略放在第一位的高尚爱国情操。

(二)工商立国,不须引进议会政治

从走上社会之日起,就与洋行、后又与洋务企业结下不解之缘的郑观应,由于爱国思想的驱使,对如何强盛祖国这一时代命题,一直给予极大关注,并有日渐成熟的见解。在他看来,抵御外侮,固然兵战不可缺少,但更重要的是与之进行“商战”。“商战”既能挫伤乃至挫败外敌侵略阴谋,又可强盛国家,达到御侮和兴邦的目的。

“商战”的思想,是郑观应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创千古未有之局,集万国来同之盛”,③2“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者)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于是乎洋务大兴,“讲求战事不遗余力,以为而今而后庶几水栗而山誓乎”。但是,光有这些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他说借兵力以“并吞祸人”,容易被人发觉而以通商“噬膏血”、“攻资财”、“培克敝国”于无形,则可令人视而不见。因此列强一旦以兵战迫立

和约,便随之以通商“销竭”其精华,使成“枯腊”。^③这种以通商为“侵伐”的结果,使被侵略国的“吃亏之处比割地岁币为尤甚。”^④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国商力不兴,那么“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照样可以“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广欲”,令你无可奈何。由此,郑观应得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⑤和国之富强“决胜于商战”^⑥的结论。

既然“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⑦那么就必须一改“民以农为本”,“有资产者不敢与洋人相争,有才智者不屑与市人为伍”的传统陋习,确立“以商为本”、“视商为士”的新规。^⑧

改“以农立国”为“以工立国”,意味着国家方针大变的根本性转变。何以确保这一转变的实施,使中国走向富强?这是郑观应必须回答的问题。根据“制无分今古,法无论中西,苟有益于民,有利于国,行之可也”^⑨的原则,郑观应提出了许多带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以财战,不以力战”。说数十年来所耗海防及相关武备经费,不知凡几,“胡不移彼就此?”主张把军费转作“商战”之用,以解决财力之不足。^⑩此其一。

打破“奇技淫巧”旧观念,确立“以工翼商”新思想。认为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即“非奇技淫巧”;^⑪“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⑫为此而提出发展机器制造业以精巧出商品、建立“艺院”以培养人材、用“名利二字驱使天下”有志之士以深研制造的主张。^⑬说中国“取威完霸之真机”,“国富民强之左券”,就在这里。^⑭此其二。

铁路既可固国防、救机谨,又可使“商贾便于贩运,贸易日旺,税饷日增”,有利而无弊;^⑮轮船同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对确立“与各国争雄海上”的地位极其重要,^⑯因此修铁路、造轮船,实为“商战”之急务。此其三。

为确保国货在“商战”中的平等竞争权利,必须“裁撤厘金,加增关税”,凡转口内地者“华洋一律征收”;在条件成熟时,改订章程,甚至“出口全行免税,进口则加重”,收回

海关大权,从总税务司到各口税司、帮办等“皆渐易华人”,废除片面最惠国待遇。^⑰此其四。

借洋债,尤其是以中国“海关作抵”的洋债;行洋钱,让折色“鹰洋”换我足宝、易我十足之货,都是中外通商以来的“绝大漏卮”。“挽回补救”之法,唯有仿照西方“筹集巨款”,创设银行,并自铸银元、发行钞票和国债(股票),从而建立起能够把握商权的中国新金融体制。^⑱此其五。

“商务之战,既应借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借官权为振作”。^⑲为“商战”股务的企业,亦“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⑳此其六。

如果说以工商立国的思想说明郑观应还没有脱离洋务运动轨道的话,那么要求在中国实行西方议会制度的主张则是他越出洋务思想樊篱,向维新思想靠拢的表现。

郑观应说,鸦片战后六十年来,万国通商,形势大变,因此谈更新、讲守旧、言洋务、论海防,皆大有人在。但他们“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显然洋务派也不懂“本原”。“本原”是什么呢?他认为“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设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㉑一语中的,郑观应的确比洋务派高出一筹。

郑观应的议院主张,大体上包含如下四层意思:第一,议院是集私广益。“公议政事”的地方,在那里“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第二,议院可使全国“朝野上下,同德同心”,“揽庶政之纲领”,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第三,议院能达民情,合民志,强民气,从而足以“张国威,御外侮”,“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何至列强在中国“群逞披猖”,非分无理,藐视公法?第四,“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认为“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希望中国能实行英德式的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㉒

郑观应对议院的认识和向往,与不久后

即澎湃于中国大地的康梁维新派的相关见解,基本相同。因此我们说,到这个时候,郑观应终于由洋务运动的拥趸,变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知音。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本文开头谈及的孙中山的三篇作品,试将它们的思想与《盛世危言》五卷本做一简要比较。

孙中山这三篇作品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一)兴利除害的改良方案。主张仿西方创立“兴农会”,以鼓励农民耕作;立“会”设“局”以劝戒烟毒,禁除鸦片之害;设“兴学会”以推动不同层次的教育,培养人材,使俗良国强。^{③③}(二)富强国家的四大纲领。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③④}(三)以农商立国的主张。认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俱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③⑤}

在孙中山看来,这些就是中国扫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弊端,而“步武泰西,参行新法”的具体实施办法。认为只要如此做去,“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③⑥}

与《盛世危言》五卷本相比,当时的孙中山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的认识水平,尚不及郑观应深刻:一是“以农为经,以商为纬”的思想,还没有脱开“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不如郑观应以工翼商、以工商立国,对泰西实行“商战”的主张切合时代脉搏;二是孙中山还没有注意到中国应该朝资本主义方向实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与郑观应君主立宪的议会主张几乎相差一个层次;三是孙中山还没有形成象郑观应那样涉及中国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理性观念,基本上仍处于局部和感性认识居多的水平线上。当然,这与孙中山的阅历还远没有郑观应丰富不无关系。但是,无论郑观应,还是孙中山,都是当时中国积极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香山籍有识之士。

三、以兴中会划界

当孙中山还在“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

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③⑦}而求助于清朝“中兴名臣”、洋务大员李鸿章的时候,郑观应还是视他为同乡的晚辈知音,给予积极帮助的,不但引荐给上海格致书院院长、著名的进步思想家王韬和颇有名声的洋务官僚盛宣怀、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而且通过盛、罗给李鸿章呈递了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使孙中山对这位“佐治”清朝的中堂大人满怀“采择施行”、“玉成其志”的愿望,^{③⑧}期待中国由此出现维新富强的局面。这个时候的孙中山就改造中国的思想来说,无论在全面性,还是深刻性方面,都是不如郑观应的。

但是,上书李鸿章失败,对孙中山的犹如冰水浇背,顿然清醒,“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③⑨}决心另辟改造中国的道路。果然,不到半年,目睹时艰,且对中日甲午战争中连连败北的清王朝完全失去信心的孙中山,在异域檀香山华侨中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正式打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④①}的旗号。如果说在1890年前后曾经具有“勿敬朝廷”的反叛思想^{④②}的孙中山,还一度寄望于中国通过和平改良方式走上富强道路的话,那么从现在起,他便毅然同改良主义分道扬镳,彼此“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④③}一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孙中山终于成为在中国进行改天换地伟大斗争的历史人物!

但是,相形之下,同期的郑观应则在滔滔向前的历史潮流面前止步不进。

1898年,在维新变法运动进入实质性阶段的时候,早就强烈要求以设立议院、制订宪法来改造中国的郑观应,却打起了退堂鼓,反对“即变”政治,说:“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④④}这与其说是郑观应对戊戌变法结局的“远见卓识”,倒不如说是他经不起政治风浪考验的表现。郑观应的政治思想和他的政治实践严重脱节!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不得不接过“维新”旗号,实行新政。此时郑观应又积极

要求实现立宪政治了,说欲除中国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开国会,设议院不可”。^④变法必以设议院、立宪法为先!

正因为这样,,郑以应虽然在诸如收回路矿权利和抵制美货等与经济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为维护民族利益,说了不少好话,做过一些好事,甚至为之出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但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风云中,扮演了不那么合乎时代节拍的角色:其一,坚持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当清政府以“立宪”骗局抵制革命潮流的时候,郑观应不但引为同道,而且把立宪的目的由“御侮”改为“安内”,建议摇摇欲坠的清政权“决不迟延”地“毅然行宪”,以使“人心悦服,党祸自息,内乱悉平”,否则“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⑤其二,坚决反对保路运动。郑观应在给清朝邮传部尚书、他的老上司盛宣怀的信中说:“粤路风潮,外似雷鸣,实无大碍。办理得窍,则迎刃而解”,请予“恩威并重”的举措进行分化瓦解。^⑥在因巡视招商局的长江业务而目睹四川保路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更把反对清朝铁路“收归国有”的斗争诬为“同室操戈”,警告人民“暴动必遭殃,毋为狂妄诱”,应该“君民共一心”,“发愤以图强”,^⑦在清政府的领导下共建中国的“富强”。其三,与康有为为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⑧辛亥革命浪潮终于迅速冲垮了清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政权。不愿看到这一现实的郑观应,在汹涌的历史潮流面前,只好如同浪中砂石,随波逐流。因此,他虽然没有公然反对中华民国,但毕竟与这一民国新时代不甚协调;虽然反对袁世凯独裁和军阀混战但实在无意为完善民国政权而努力。总之,郑观应不是中华民国的真正拥护者,倒很象康有为队伍中的一员。不但说“历查中外史册,皆由君主而变君民共主,由君民共主而变民主”,^⑨“未经君主立宪之阶段,而遽希望民主”,有违历史发展规律。^⑩而且十分赞赏康有为把包括袁世凯独裁专制在内的一切社会腐败现象全然归罪于“民国”、进而主张倒退以行君主立宪的《共和平议》,称它“痛言中国非民主立宪之时,指陈利害,洞若观火”。^⑪无可奈何的郑观应,终于把希望寄托在“修身立己”的“孝悌忠信礼义谦耻”

为“本原正大之学”的“教育救国论”,和修道士“圣王”以救国的飘渺梦幻。

地灵人杰。香山籍的郑观应和孙中山,都是近代耀眼中华的璀璨明珠。如果说郑观应是一个毕生求取中国富强的思想家和企业家的话,那么孙中山就是民主革命的政治家和领袖。在兴中会成立之前,郑观应以爱国为根本,商战为核心,开议会立宪法为精髓的思想,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是在系统完整性方面,都为孙中山所不及,不愧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但是,随着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接二连三的惊世骇俗的表演,郑观应的历史地位便日益相形见绌。辛亥——壬子年间,孙中山终于以革命家和胜利者的形象矗立于世,这更是郑观应所不能比拟的。但郑观应始终不改爱国初衷,一生致力于实业救国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还在为教育救国而努力的品德,仍然十分值得后人肯定和纪念。郑观应既为香山增添了历史的光彩,也不失为衬托来自同一方热土的历史伟人孙中山这朵红花的绿叶。

注释:

- ① 郑观应:《易言》(二十篇本)“自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以下简称《郑集》)上册,第1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 ② 《救时揭要·余治序》,《郑集》上册第3页。
- ③ ④ 《易言》(三十六篇本)“王韬序”,《郑集》上册第61、62页。
- ⑤ ⑥ 《盛世危言》(五卷本)(以下凡“五卷本”不予括注)“郑藻如序”,《郑集》上册第228、229页。
- ⑦ ⑧ ⑨ 《盛世危言》郑观应“自序”,《郑集》上册第233、235—236、233页。
- ⑩ 《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后序”,《郑集》上册第933页。
- ⑪ 见张克林:《孙中山与列宁》,第2页,南京拔提书店,1934年。
- ⑫ 见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9页,中华书局,1981年。
- ⑬ 胡去非:《总理事略》,第11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
- ⑭ ⑮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6、47页,中华书局,1981年。
- ⑯ ⑰ 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3页。
- ⑱ ⑲ 孙中山:《农功》,同上书,第6页。
- ⑳ ㉑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同上书,第8、18、15页。
- ㉒ 郑观应:《弭兵》,《郑集》上册第924、925页。

- ①② 郑观应：《海防下》，同上书，第 760 页。
- ③ 郑观应：《民团》附言，同上书，第 901 页。
- ④⑤ 郑观应：《边防上》同上书，第 774—775、773—774 页。
- ⑥⑦⑧ 见郑观应：《边防下》，同上书，第 785—787、760、787 页。
- ⑨⑩ 见郑观应：《练兵》，同上书，第 855、856—857 页。
- ⑪ 见郑观应：《火器》，同上书，第 907—917 页。
- ⑫ 郑观应：《民团》，同上书，第 899 页。
- ⑬⑭ 郑观应：《商战》附录，同上书，第 592 页。
-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见郑观应：《商战》，同上书，第 586、589、591、593、590、588、590 页。
- ㉓ 见郑观应：《商务》，同上书，第 614、616—618 页。
- ㉔ 郑观应：《邮政上》，同上书，第 670 页。
- ㉕ 郑观应：《西学》，同上书，第 270 页。
- ㉖ 见郑观应：《技艺》及其附录，同上书，第 720—721、725 页。
- ㉗ 郑观应：《技艺》，同上书，第 723 页。
- ㉘ 见郑观应：《铁路》，同上书，第 652—653 页。
- ㉙ 见郑观应：《税则》，同上书，第 543—546 页。
- ㉚ 分别见郑观应：《国债》、《商战》、《银行上》、《银行下》，同上书第 583—584、588、679、682、691—692、582—583 页。
- ㉛ 郑观应：《开矿》，同上书，第 704 页。
- ㉜ 均见郑观应：《议院》，同上书，第 311—314 页。
- ㉝② 孙中山：《伦敦蒙难记》，《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52 页。
- ③ 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同上书，第 20 页。
- ④ 宋庆龄：《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4 日。
- ⑤ 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32 页。
- ⑥ 郑观应：《致经君莲庵书》，转引自夏东元：《郑观应传》（以下简称《郑传》）第 162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年。
- ⑦ 郑观应：《致盛京御论变法宜设上下议院书》，《郑传》第 169 页。
- ⑧ 见郑观应：《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檀香山自治研究会书》，均《郑传》第 230 页。
- ⑨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宣统三年五月廿六日、六月卅日，《郑传》第 232 页。
- ⑩ 见郑观应：《蜀路闹事感作》，宣统三年中秋，《郑传》第 233、234 页。
- ⑪ 《中山先生墨迹选萃》第 8 页，中原出版社，1986 年。
- ⑫ 郑观应：《呈张政治真人书》，《郑传》第 240 页。
- ⑬ 郑观应：《与许君如山、汤君昭台论宪法》，《郑传》第 248 页。
- ⑭ 郑观应：《致潘兰史、何同樵两君论共和书》，《郑传》第 248 页。
- ⑮ 见郑观应：《招商局公学开学训词》，《上吕纯阳祖师、陈抱一祖师、张三丰祖师、何含藏祖师真》，《郑传》第 258、252 页。

洗玉清

教授

年谱

□ 庄福伍

